

Chinese Medicine in View of Chinese Culture

从中医看中国文化

李建民 / 著



名师讲堂 MASTER'S LECTURES

0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Chinese Medicine in View of Chinese Culture

从中医看中国文化

李建民 / 著



名师讲堂 MASTER'S LECTURES

0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中医看中国文化 / 李建民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名师讲堂)

ISBN 978 - 7 - 100 - 11860 - 6

I. ①从… II. ①李… III. ①中医学—普及读物
IV. ①R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632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从中医看中国文化

李建民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860 - 6

2016年3月第1版

开本 710 × 1000 1/16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 1/4

定价: 56.00 元

目 录

序001

另类医学？反思中医文化005

- 1 “国学”与中医文化通识 005
- 2 古典医学的知识根源 010

疾病的历史055

- 3 先秦至中古“病因观”及其变迁 055
- 4 掩埋尸体礼俗与疾病的想象 086
- 5 鬼神之病与“场所” 112

中医技术及其自然、性别、政治意义165

- 6 艾火与天火——中医“灸”疗法的起源 165
- 7 “附子”毒药在政治中的运用 182
- 8 传统家庭的冲突与化解方术 205

想象身体231

- 9 唐代“肺石”的身体想象 231
- 10 中国方术史上的“形影观”及技术 239
- 11 17世纪脏腑图说的身体观 258
- 12 明清抵抗火炮的法术身体 295

纯粹手术323

- 13 3世纪华佗故事的新解释及启示 323
- 14 16世纪中医“反常”手术史之谜 336

跋：我学习医学史的经验浅谈363

序

“中国文化”给予我个人最初的意象竟然与“沙漠”有关联。我是在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1970年代末，求知似渴的年纪，我在那个城市街角旮旯的书报摊，找到一本台北运来的杂志《仙人掌》。标题醒目：“中国未来动向”、“中国的出发”……沙漠中开花的“仙人掌”，文化沙漠里的中国台湾。其实我从没见过真实的沙漠。

1970年代末，站在城市的电影院前面看大大的剧照，是一种幸福。胡金铨的武侠电影就是我“中国文化”的世界。那是个无穷党争、社盟的想象天地。胡金铨作品的“侠”大多有长长的官銜。《天下第一》（1983）的男主角张伯谨是个医生，全片百看不厌的是针灸治病的游刃场景。这个电影故事由后周世宗寻找民间医生治病而展开的。“武侠”其实讲的是政治权斗，也是政治智慧。

1980年代初，我北上当兵，在一条叫“重庆”的街道买了一本小册子《通鉴选注》。那时台湾出版商人翻印的国学书籍，都改了书名、作者名。这个读本的作者瞿（蛻）园先生是谁呢？小书有作者长长的序，剪裁衬帖的古文，清楚明白的白话注解，贯穿战国到五代的历史关键事件的解说，是中国史的

极佳入门。后来知道此作品的作者“瞿蜕园”有着“通人”洞见，便尽所能找了他所有的著作浏览一过。《通鉴选注》给我的一个启示，中国文化的主轴是“政治”。

不仅中国文化的主轴是政治，连中国最好的诗也很“政治”。我在台湾大学求学时，读过一些“史学方法”的书，其中最为难忘的是洪业的《我怎样写杜甫》。这是一本57页的小册子。直到现在，这本小书仍是我推荐给学生的“治史”启蒙书。洪先生告诉读者如何以374首杜诗来写杜甫的历史。这位曾“卖药都市”的诗人，作品一往情深而不愆于义。洪业先生说杜诗至情的一面在“忠君爱国”。

中医（广义）的《黄帝内经》也是政治智慧之书。它是一个侠的世界。治身、治国二而一。医者意也；政治也是一个“意”。《素问》无疑的应与《论语》、《庄子》、《红楼梦》成为中国人的生命经典，终身以为师资。中国文化所结的“同晶体”（isomorph）是中医的自衍、滋生的体系。中医比附成“科学”是骆驼看做马肿背。中医是历来中国人如何过好的生活的智慧。

中国文化主要的两大流派，都与“政治”的关怀有关。一是带有目的或伦理性的，如儒家等。一是“技术流派”。今天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文化，不能只提倡儒家思想，那即是一座倒立的庞大金字塔而无法立起来。通过中医的历史“移感”重看自己的文化是一种方式。

章太炎即将中医列为“哲学”。在其命名为《葑汉》的几本小书，可作为一部中国文化史散论。章氏以为百家技艺有与儒术相通者，如按摩、剑术等都讲求调气习定的道理。又论张仲景，主要是饮食养生日用，每令节俭，无令暴疾，及季节的生活习惯。他推崇中国医学《伤寒论》一支独尊，如“肠痈”服用大黄牡丹汤，效果不下于手术。

中国医学史有两个重要转型时期，一是南宋，一是明末清初。前者

的特色是内在化，中医并不在技术上突破，而更追求身心修为及内证。这在现代医学科技发达的后现代，别具意义。南宋代表的是王硕《易简方》一系的医学流派，其精神流风一直存在。其次，中医所谓“复古”，真正是从明末开始的。中医的“古”只是一个“如”（as）字。我们试图在历史找“那诠释的如”（the hermeneutical as），心摹手追。我们重看了中国文化，相信曾经不相信的，就像“开始”看见那样来观看许多事物（believing is starting to look a lot like seeing）。

我较早阅读的一本医学史，有王吉民的《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王先生是西医，却欣赏中医。他的医学史有一节“游戏”，游戏也是医学。后来我的硕士论文的灵感即本于此。文化的原创力往往出自悠闲、游戏而有余裕。

犹太思想家 Romano Guardini 曾经以“群众人”（mass man）来形容我们现代人。群众人是一群被现代科技与“理性抽象化”所掌控的人们。群众人只顺服机器、技术的身体感，与抽象计划的生产模式。群众人逐渐失去了“位格”（personality），失去“人”的存有价值。中国大陆新一波文化工程是对物化（fetishized）的人及其关系的救赎。

我们以“中医的”眼光，重看中国文化，仿佛是“熟悉化”的持续过程。熟悉化是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所说的“原创”。“熟悉”（heimlich）不仅是中国文化中隐藏的一面重新理解。熟悉也有“本土的”意思，中国的本土。理解中国文化必须“中国化”。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中国文化的复杂与内在张力，往往就是在改写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情景，作为正负情愫的嘲弄对象。我们都认为“太熟悉”中国文化的某些本质了。而“熟悉化”是用熟悉的事物如中医日常生活形态（不是医学专业），去理解业已“陌生的”中国文化而诉合无间。这是作者兢兢自守不敢强作解人的。

中国医学有明暗。中医不只是看病把脉、技术的。文化的戡释上，我

更喜欢闇暗、隐去不谈的部分。于是我们到达那最昏黑的一角，面对面，看见中国文化的优美与韧性；那曾经使我们失去本土身份，使我们分裂的争论的历史长流里。我们找回对中国文化的“敬畏意识”，共同对着文化存有意识而新奇惊讶，就好像再一次注视了不落凡近、无穷无尽的天空星体。

李建民

2013年12月11日

另类医学？反思中医文化

1 “国学”与中医文化通识

自1990年代初至今，中国持续着“国学”的热潮。这股热潮不仅活跃于文化、学术界，而且扩及地方、社会团体。李零将过去二十年的国学热形容为“一种近似疯狂的离奇现象”。他似乎视这股不小的潮流，是一个政治化的“举国”狂热。但也不能否认，在其中有个人或团体为传统价值系统的起信及安身立命之道，自发地寻求精神资源。李零在《去圣乃得真孔子》中提到中医，意思是“新儒家”之类的思想流派的“精神胜利法”与中医相同：“它要保留的只是内圣，就像中医，丢了地盘，最终还要领导西医——在理论上领导西医。”¹这是说中医的技术“地盘”不行、最终只能讲一些理论高调吗？

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医”，不但极为丰富、复杂，而且存有不同的层次；我们在客观地寻求理解的同时，也不断地做理性的反省。我即想利用余英时先生《“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一文，对“民国”时期“国学”研究的分期，及不同阶段研究的特色及成果，以作为当下“国学热”的借鉴。²

余英时先生将“民国”时期的国学运动分为两期：第一期是清末至1917年；第二期是1917年至1949年以前。这两大段落的分水岭，大致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划界的。先说国学研究第一期。

1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北京：三联书店，2008）。

2 余英时，《“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人文与民主》（台北：时报文化，2010）。

清末以来的学人以“国学”来作为与“西学”的对照，但也以为西学应该与国学融会贯通。梁启超即说：“今日欲使西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遽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饮冰室文集》）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近代中、西医学。王国维也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观堂别集》）而中、西医学同时地进入“盛则俱盛”的阶段。西医对中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已不像历史上几个时期只在一枝一节之上，而是更为系统、全面的。

国学研究的第二期，可以胡适 1922 年在北大《国学季刊》所写的宣言为代表。这篇宣言认为国学最重要的使命，是要对过去的中国文化进行“专史式”的系统研究。余英时先生说：“国学研究必以建立中国文化史的整体架构为最终归宿”。¹这一规划对今天的国学热或许仍具有导向的意义。中国医学史作为不可忽略的“专史”之一，与整体的中国文化史应有更为有机的连接。

第二期的国学研究还有两项特色。其一是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二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科全面进入到中国的高教体系之内。这两种情况，在中医学术、教育也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以科学、实验室的方式来解释、证明中医的理论。不过，中、西医尽管不断寻求会通、结合，但在许多关键处多是二水分流的局面，而“互相推助”的趋势却无疑更加紧密。

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上，国学研究的第一期，章太炎、廖平都有相当丰富的医经、医史的著作。章太炎《论宋人煮散之得失》讨论古今用药权量之变化，涉及宋人改汤剂为煮散的历史背景：“宋人所以创为煮散者，盖由五代分裂之际，远方药物，致之不易，于是减省用量，而以散煮服之。迨及宋时，遂为常法。”²南宋煮散风气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饮片为原料的汤剂。³

廖平曾辑录、评述中医的文献二十余种，题为《六译馆医学丛书》。他

1 余英时，《“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页 48。

2 章太炎，《章太炎先生论伤寒》（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页 133。章氏医史作品，见《章太炎全集（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郑金生，《药林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180~183。

的著述将医学与经学交互会通。例如,《分方异宜考》论医书的五行之学,“若医家专门切要之事,则详经络,考部位,识病名,知针药,于《内经》中取其切要者,不过二三十篇。其通论治国,医人皆所合通者,不过三四十篇。其高深玄远之《阴阳大论》,与政治阴阳五行家之专篇,则尽可束之高阁,书少功多,庶乎可以自得?收五行之归经学,日辟国万里,治法可以重光。”¹简言之,医书多言治国之道,经学史研究也应留意古医家之论述。廖平又说:“古者经学政法专书,多说人身脏腑。《五经异义》、《白虎通》、《五行大义》、《淮南》、《申鉴》,皆是也。医道通于政治,如《十二官相使篇》,其尤著者也。”²可见经学之书言人身脏腑,不专为治疗;政法与医学两者貌似神离,用殊理同。

廖平又将《黄帝内经》的内容,析分为“政治、医诊二大派”;这本经典之所以兼言天道人事者,“《内经》本为皇帝外史所掌,旁涉于医”³这些说法,正如匡衡说诗可以解人颐。他认为《内经》治病的专篇,《小针解》、《针解》、《八正神明论》、《阳明脉解》、《脉解》等五篇,“历来解家未能合之以成两美,大抵分篇作注,不免肢解全牛。”⁴因此,他主张将上述五篇合读,以相得益彰。

国学研究的第二期,陈垣、柳诒征、吕思勉等几位国学大师都有中医文化研究的相关著作。陈垣的医学史的论文很多,主要发表在《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刊物。他的医学史研究,多具现实之意义。如《释医院》一文,追溯“吾国医院之制,盖起于六朝矣”。自此以降,唐有“养病坊”,宋有“安济坊”,金元有“惠民药局”等,这些都是官方设立为治疗贫民之疾的。陈垣先生说中国人历来有“以医院为不详者”的禁忌,与西人心态不同。⁵他说住

1 廖平,《廖平医书全集》(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页1332。

2 廖平,《廖平医书全集》,页1351。

3 廖平,《廖平医书全集》,页1358。

4 廖平,《廖平医书全集》,页1357~1358,黄榕序。

5 陈垣,《陈垣早年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页238~242。

医院有时为必要：“有病须施行手术者必须入医院”，“有病能传染家人者必须入医院”。¹ 医院的历史，与“现代”医疗技术、卫生制度的革命有密切关系。

柳诒征在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史》，包含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举例来说，柳诒征认为中医早期重视解剖、手术，外科发达；有人认为中医治疗倾向“内治”并不正确。他说：“盖古人精于全体之学，剮杀剖割，初非异事，与今世西人之治病相同。”又说：“后世独祖张机，于一切病，惟恃诊脉处方之术，是汉代实古今医法变迁之枢。”² 所以，以“诊脉”、“处方”（汤剂）为主流的“方脉”（内科）一支，并不足完全说明中国医学之全貌。中医在骨伤科、疡医也有独特的传统。

吕思勉的《中国文化史》的“文化”不是狭义的学术技艺，而是“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³ 这本书是以各类专史如政体、刑法、实业等攀上“通史”写作的宏构。他在为近代医学史大家谢观撰写的传记《谢立恒先生传》（1935），即叙述兼通医术的儒者传统：“君于医，虽不以是为业，顾自幼熟诵医经、经方，长而浏览弗辍，亲故有疾，或为治疗，遇儒医、世医、若草泽铃医，有一技之长者，必殷勤询访讨论，未尝一日废也。”⁴ 谢观肄业于东吴大学，习地理之学；年少曾从马培之门下学医。吕思勉说，“予尝与君上下其论议”，⁵ 国学与医学应可对话、相通。

可见，大师们（他们都不是执业医师）的眼光与今日“内史”取向的研究者或有不同，不少仍具参考价值。从他们所关怀的如外科、医院、儒医等课题，及提出的洞见，显示了极为独特的视野。

余英时先生回顾第一、第二期的国学研究，指出当今国学研究的处境、脉络：“我要郑重地指出，一方面由于西方中心论、科学主义走向式微，而另

1 陈垣，《陈垣早年文集》，页240~241。

2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台北：正中书局，1993），页416~417。

3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9。

4 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页2。

5 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页4。

一方面文化多元论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国学作为一门学术已不再有消解于西学之中的危险。中国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虽在近百年中受过西学的不断刷新,却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¹在此我并无意倡说“医学多元论”,以免误导视听;但中医经过百年来的纷扰、打击终究保持住其“文化身份”,这一点是我个人所深信的。德国学者蒋熙德(Volker Scheid)最新的论著可以支持这个看法。

蒋熙德的新作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孟河医派三百年》),探讨江苏武进镇孟河起源的一个中医流派史及其相关分支的兴起、扩展的漫漫过程,时间长达四个世纪。²孟河学派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7世纪初叶,费氏家族迁至孟河始,通过血缘、婚姻、师弟及其他社会、政治网络,逐渐由孟河往上海扩散,形成错综复杂的医学家族(medicinal lineages)。第二阶段,在上海名医丁甘仁的提议下正式出现了“孟河学派”这一名词;而以上海为民国时期的医学中心,这个学派产生了“分歧的现代性”的微妙变化。如利用传统乡籍的关系建立新的医学校、团体及学术期刊。而传统“国粹”(national essence)的潜移默化,及追求儒医道德的理念已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过程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阶段是1949年以后,中医的发展受到国家的支持,以及政治、现代化的持续要求。相对来说,前两阶段的家族、社会关系网络受到很大的弱化。中医的传统虽然经历多次强烈的变迁但却保持一定的稳定结构。所谓传统是一套文化体系的保存、继承与改造。而文化是意义创造的具体实现,中医本身蕴含的意义结构不只是其技术的基础,同时也贯穿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读哪些书?1870年代的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建议的书单包含中医经典。《书目答问》挑选的中医典籍以唐以前为断限,一共十三部。³有些中医典籍,非专家也应该读,这不是张氏个人之见解。

1 余英时,《“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页63。

2 蒋熙德, *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 (Seattle: Eastland Press, 2007)。李夏亭主编,《孟河医派三百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3 张之洞、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台北:新兴书局,1962),页139。

近代四川国学大师刘咸炘在《学略》中提示一般读者：“《素问》为理祖，非专门亦可读。李时珍《本草纲目》可考草木名类形状，亦有益于学者。”¹粗备国学常识的现代公民应该可以读《素问》原文。所谓的“理祖”，是指《内经》提供了养生、治病甚至修养、治国的规律。这里的“非专门”、“学者”，指的不是执业的中医师，而是中医在技术层面以外，其知识系统可能成为更多人的“文化通识”。这在传统社会称之为“士大夫之学”，指的是“略观大意”、“存其大体”的读者及做人境界。²它与“专业”、“专家之学”不同，强调的是对国学中的各类学问的贯通、综合。“文化通识”希望培养现代公民对公共事务、日常生活的判断能力与人文修养。段逸山先生说，“由儒而医的现象”非常普遍存在于整个中国医学史中。³

本章的论旨，不是通过国学来理解中医，而是中医本身即是国学的核心文化资源之一。中医与儒道是国学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而我们为现代人所做的不同层次中医文献及历史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成“中医文化通识”的深化及普及。

2 古典医学的知识根源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颡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

——《吕氏春秋·序意》⁴

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验于来今者，先知日之寒温、

1 刘咸炘，《学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66。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页596。

3 段逸山，《段逸山举要医古文》（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页3。

4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书社，2002），页1209-1211。

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观其立有验也。

——《素问·八正神明论》¹

古史传说与知识传承

有些现代的中医师说，中医云云是一门“经验”医学。然而有哪一种传统医学没有经验的层面？巫术、仪式性的医疗也可以宣称自己是具有经验事实，并且历经长期积淀而有验效的。那么，中医知识真正的特色在哪里？

什么又是“经验”？当我们说一个医生很有经验时，这个经验意指直接、个人与证据性的，同时也蕴含其对个别病人有一连串切身的经历。因为医生治疗的对象不仅是“人”，而且是个别的人。临床的判断力无法靠共相的知识专擅，因为医生必须不断面对新的状况做出判断。而医生的经验受历史制约，特别是经典提供了诠释经验的范式。换言之，经验即诠释，是以历史传统为中介的“经验”。

现代中医的“经验”，不是完全脱离经典传统（特别是早期传统）的独立源泉。

关于中国早期医学的探讨，由于1970年代大量出土文献而方兴未艾。²传世医学文献的断代与核心医学观念的重写与重建，成为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显学。³其中，特别值得深入的是，不同历史氛围的主导性思想及制度与医学技术之间，所产生的呼应与唱和。例如，徐复观即认为《吕氏春秋》是认识汉代学术与政治的骨干，“离开了《吕氏春秋》，即不能了解汉代学术的特

1 龙伯坚、龙式昭，《黄帝内经集解·素问》（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页372。参见龙伯坚遗作《黄帝内经考》，页1157~1293。

2 马继兴，《中医古典文献遗产实物发掘与继承研究的重要价值》，收入江润祥编，《现代中医药之教育、研究与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页73~87。

3 韩健平，《经脉学说的早期历史：气、阴阳与数字》，《自然科学史研究》23卷4期（2004），页326~333。

性”，其思想以渗透融合之威力，在这段时期发生了几乎无孔不入的指导性作用¹，当然包括医学思想在内。

《吕氏春秋》发挥人君养生之旨，在全书占相当重的分量。养生可以“全其天”，并与天地及天下相通感。²《吕氏春秋》的作者吕不韦（文信侯），将其书依托于黄帝教诲颛顼的圣言；上述的养生长寿与推历建制、效法天地的原则是一致的。王利器在其具有里程碑性《吕氏春秋》疏证的工作，以“春秋、素王、大一统”指出这本书的题旨为“治历明时”、“上观尚古”³，这种政治的宇宙论里，养生、物理、政事搏为一气。吕不韦将这种思想著作追溯于“古之清世”的帝王。

古典医学的知识传承也氤氲在古史传说中。⁴《黄帝内经》⁵关乎生命奥秘的言说，以黄帝为中心，有五师（岐伯、伯高、少师、少俞、鬼臾区）一徒（雷公）的应对问答；⁶一如《吕氏春秋》把“古之清世”作为创作的黄金盛世，《内经》“法往古者”也归于古代圣人所遗传的《针经》。⁷《内经》的医学论述不仅以黄帝君臣的格式展开，人体与国家的感应理论更饶富政治意涵。⁸正如席文（Nathan Sivin）教授所指出的：“他们创建的体系，不仅是一

1 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收入氏著，《两汉思想史》卷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页1~83。又，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页201~211；刘殿爵，《〈吕氏春秋〉的贵生论》，收入氏著，《采掇英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页243~258。

2 徐复观，上引书，页34~40、41~48。

3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页8。

4 古史传说的新研究，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收入氏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页18~45。

5 席文（Nathan Sivin），《黄帝内经》，收入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页206~228。

6 山田庆儿，《中国古代医学的形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页19~36。

7 廖育群，《岐黄医道》（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页73~75；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页82。

8 金仕起，《论病以及国——周秦汉方技与国政关系的一个分析》（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

个政治体系,也是一个宇宙体系和一个人体系统。我们必须理解这个体系的多重性质,特别要理解为什么在各种科学独立发展之后,这种有政治意味的系统还如此有吸引力。”¹这种医学的文化多样体,无疑是我们探索古典医学的核心所在。

“禁方”时代——秘密的医疗技术

中国医学的起源包围在传说之中。这段医学形成的关键时期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有关医学的记载极少,医家彼此知识受授的系谱不明;除了扁鹊、淳于意、华佗、张仲景几位名医以外,大多数是传说的人物。而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禁方”或“禁方书”这样的概念。当时的医学文献透过秘密的仪式流传;正如索安(Anna Seidel)形容早期图书的机密性:“书写文书被一种类似于传统宝物的神圣气氛笼罩。”²宝物如玉、贝,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³医学文献在这种氛围之下,与其相关的“经验”、“师资”的实质内涵是迥异于后世的。先秦的医学知识主要保留在官府,其隐秘性自不待言。《汉书·艺文志》说的很清楚,“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方技在古代是广义的“医学”,包括房中、神仙之术。顾实解释这段话:“《晋语》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秦和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固医官也。’盖古医字亦作𠄎。上世从巫史社会而来,故医通于治国之道耳。”⁴当时官府的医学活动,在《左传》、《周礼》等书略有反映。⁵但系统性的医学论述大致是战

1 席文,《中国、希腊之科学和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国学术》总第9辑(2002),页125;中山茂,《历史としての学问》(东京:中央公论社,1974),页31-81;G. E. R. Lloyd, *The Ambitions of Curiosity: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特别是页126-147。

2 索安,《国之重宝与道教秘宝——谶纬所见道教的渊源》,《法国汉学》4辑(1999),页50。

3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1-2。

4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页254。

5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页120-138。